

探展记



参展单位达28家,共溯文化壮举

此次展览由河南博物院、孔子博物馆、济宁市博物馆共同策划推出,目的是借助丰富的孔子相关文物,结合孔子周游列国核心区域留存的文化遗迹与历史文物,以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回溯孔子周游列国的文化壮举,解读儒家思想的人文内核,传承孔子“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力量。

本次展览堪称一场文博盛宴。河南博物院院长赵小龙介绍,除了立足于河南博物院收藏的东周时期列国文物,孔子博物馆的孔子题材书画藏品和孔庙祭器,以及济宁市博物馆的成套东周礼制用器外,策展方还向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文博机构商借参展文物,使得参展单位达到28家,参展文物共计197件(组),涵盖青铜礼器、玉器、书画、陶器、骨器等文物类别,规模与规格均属上乘。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博物馆的“明彩绘孔子圣迹图”一改传统的展陈模式,被分散陈列于展厅各个区域,成为贯穿整个展览的线索性展品。观众循着这套“连环画”,便能清晰梳理出孔子跌宕起伏的一生。孔子博物馆馆长郭思克说,该馆遴选了46组馆藏珍品参展,涵盖“商周十供”“明彩绘孔子圣迹图”及包括“三圣像”在内的多幅珍贵孔子画像。

新蔡县博物馆的孔子铜造像同样难得一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为营造尚学之风,刑部主事曹大夏筹巨资铸造了两套高1.25米、重达数百斤的孔子铜像,以及规格略小的颜曾思孟“孔门四杰”配像,一套赠予曲阜孔庙,一套藏于新蔡文庙。曲阜所藏早已损毁,此件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一尊明代孔子铜造像。

展览第一部分“问道——理想与现实”,借助青铜礼器、拓片等实物展品,搭配多媒体动画、创作画等辅助形式,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代大背景,揭示了孔子“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一坚定信念的由来,以及他为践行理想所开展的问礼实践与政治尝试。驻足于此,观众不难感受到乱世之中孔子的深刻思考与执着坚守,更能读懂“理想与现实”这一跨越千年的永恒命题。

想要理解孔子的思想,必先厘清其源头。展览开篇陈列的,是河南博物院馆藏的青铜觚。作为古代酒器,青铜觚容量二升,“取名觚者,寡少义,戒人贪饮”,蕴含着劝人节制的深意。但在春秋时期,公卿大夫沉迷饮酒之风盛行,即便用青铜觚饮酒,也丝毫没有节制之意。面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现状,孔子发出了“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深沉感慨。这件文物虽不算稀世珍品,但其背后承载的时代印记,让它在这个展区中显得意味深长。

在青铜觚旁陈列的,是大名鼎鼎的“王子午铜鼎”。这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重器,出土于河南淅川楚墓。楚国名义上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却早已僭越称王,甚至擅自使用王礼。这套列鼎共七件,器主人王子午是楚庄王之子,在楚康王时期曾担任楚国最高执政“令尹”。按照周朝礼制,诸侯的卿大夫级别,比照天子的大夫,只能使用五件成组的列鼎。王子午使用了七件列鼎,正是诸侯僭越礼制的直接物证。

来自山西博物院的“陈喜铜壶”,其铭文记载了陈喜执掌齐国政权的史实。陈氏是从陈国逃难到齐国的公子完的后代,也就是史书中记载的田氏。陈喜即陈偃子,《史记》中记作田乞。春秋末期,田乞担任齐国大臣,齐景公在位期间,他以“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笼络民心,使得田氏宗族的势力日益壮大。公元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弑杀齐简公,孔子得知后,恳请鲁哀公及“三桓”出兵讨伐田恒,以正君臣之义,却最终未能如愿。春秋晚期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移,公卿势力逐渐坐大;鲁国有“三桓”四分公室,晋国有三家分晋,齐国则发生了田氏代齐的事件,传统社会秩序崩塌。

课本上“礼坏乐崩”的抽象概念,在展厅里的一件件文物前变得可感可触。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各国针对权力下移的现状展开反思与变革,一些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悄然萌生,“人道”“民本”理念以及跨越阶级的“尚贤”思想等逐渐成形。

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在心理上更贴近下层民众,这也为其仁道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对周礼的尊崇,又让他将恢复周礼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时期井然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这种秩序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他在鲁国担任大司寇并执掌国政期间,曾以“堕三都”的举措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掌权的“三桓”在利用孔子摧毁家臣叛乱、稳固自身地位后,便阻止了孔子进一步削弱公卿权力的政治行动,孔子的理想在鲁国遭遇了重大挫折。

这一部分的展览,以一组璧、环、玦收场。在古代,人们常借特定器物传递心意、表达志向,也就是“借物言志”。比如,以璧表示愿意施以援手;又如,“逐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还,赐玦则绝”,环与玦的不同赏赐,直接决定了逐臣的命运。孔子在鲁国饱受排挤后,仍抱着一线希望,在边境等待鲁君的最终决断。然而,季桓子派来的使者,既没有带来表示召回的环,也没有带来表示断绝的玦。季桓子或许是不想承担赶走贤人的罪名,才采取了这种模糊的态度。无奈之下,孔子只好主动离开鲁国,开启了周游列国的漫漫征程。

孔子践行周礼的每一步,都踏在传统与变革的裂隙之上。时代的变局,给了孔子崭露头角、践行理想的机会;而社会的混乱现状,又同样限制了他理想的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让孔子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沉淀、升华。



孔子圣迹图之“子路问津”

周游十四载 弦歌越千年

本报记者 张九九

礼行之路坎坷,列国文物记录点滴

公元前497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在之后的十四年间,孔子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虽始终抱着“人能弘道”的志向,怀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的愿望,却因与各国君主“道不同”而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孔子对政治的热情逐渐冷却,但中原大地的深厚底蕴滋养了他的宏大抱负,乱世的烽烟磨砺了他的中庸思想,金戈铁马的岁月见证了他的仁政宣言。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被迎回鲁国。

展览第二部分“弘道——礼行中原”,以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为核心脉络,通过“去鲁适卫”“取道曹国”“微服过宋”“郑郭遗立”“在陈思归”“负函观楚”等多个单元,全景式展现了这段充满挑战与艰辛的历程。

据《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从负函返回卫国途中经过仪邑,当地封邑长官主动请求拜见孔子。彼时的孔子,既已失去在鲁国的官职,在卫国也未能安身,游历多国却始终未能践行自己的思想主张。即便如此,孔子从未降低自己的仁道标准去迎合世情。仪封人拜见孔子后,感慨“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称赞孔子像木铎一样,传递上天的教化。如今,河南兰考县仪封乡仍有请见书院,纪念这一典故。在展览中,出土于河南桐柏月河1号墓的“养子伯受铜铎”造型别致,引人注目。木铎是以木为舌的大铜铎,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官员会巡回振鸣木铎,以引起众人注意。这件铜铎的展出,让仪封人眼中“为木铎”的孔子意象变得具象可感。

这样将典故与文物巧妙结合的设计,在展览中随处可见。比如,为了展现“捍卫击磬”的典故,展出了河南淅川和尚岭2号墓出土的春秋石编磬;讲述“微服过宋”的经历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宋公栾铜簠”、上海博物馆藏的“宋公差铜戈”等宋国文物一一亮相;介绍“郑郭遗立”的故事时,郑公大墓、郑韩故城等知名遗址出土的郑国文物,让观众得以窥见当时郑国的社会风貌。

楚国在江汉地区称霸数百年,尽管被中原各国斥为“蛮夷”,但在追寻周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丝毫不逊色于周封列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在这一部分的展览中,风格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楚国文物,成为当之无愧的亮点。信阳博物馆的鸟形柱首与方器座,2005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9号墓,是楚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这件器物造型独特,柱首以鸟形雕琢而成,栩栩如生,尽显古人对飞禽走兽的细致观察与精湛的雕塑技艺;镂空龙纹方座则以繁复精美的线条,诉说着龙作为古代神话生物与王权象征的深厚文化内涵。这件文物曾亮相上海博物馆“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成为备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此次再度展出,让观众得以充分感受浓郁的楚文化魅力。

展览中还展出了两批楚简原件,每一批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一批是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信阳楚简,其书体为楚系古文,字势开阔,结体匀停方扁,呈现出从商周金文大象向秦汉隶书过渡的鲜明特征。关于这批楚简的内容,曾引发儒家典籍与《墨子》佚文之争,在学术界轰动一时。另一批是1994年发现的新蔡葛陵楚简,以楚国文字书写而成,内容包括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赠书。该墓的主人是楚国封君夜君成,新蔡原本是楚国的核心区域,后来被楚国吞并,从这批文物中,不难感受到当年楚国的强盛国力。



- ①王子午铜鼎 河南博物院
②鸟形柱首与方器座 信阳博物馆
③陈喜铜壶 山西博物院



②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展览第三部分“承道——弦歌万古”,将视角从孔子周游列国的历程,延伸至儒家思想千年不息的传承脉络。本部分设有“集贤赞之大成”“立万世之师表”等多个单元,展出了故宫博物院藏敬器、荆门市博物馆藏郭店楚简等精品文物,呈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阐释了孔子思想的影响。

返回鲁国后,孔子被尊为国老,获得了极高的尊崇。饱经沧桑的他,此时超然于具体政事之外,将自己的智慧与热忱,倾注于更为不朽的文化事业中。通过删述六经,整理文献,孔子保存了华夏文明的元典,更在其中融入了“仁”的核心,“礼”的规范,“义”的担当与“和”的追求。

济宁市博物馆藏的一套春秋书刻工具,在这一展区亮相。这套工具于1978年在薛国故城被发现,据考证,墓主人是春秋时期的薛国国君。整套工具包括:青铜铎、凿、斧、锯,主要用于切割、加工竹筒木牍;磨石用于竹筒木牍的表面打磨及利器的磨削;青铜刀,削用于刻字、剔字,以及简牍文字的细部加工;青铜针,钻则用于竹筒的钻孔。“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套保存较为完整的春秋书刻工具,为研究春秋乃至西周晚期的书刻工具及其制作技术,提供了完备的实物资料,也让观众得以直观感受孔子整理文献、删述六经时所使用的工具风貌。”济宁市博物馆馆长张超介绍。

孔子一生致力于授徒教学,向弟子传授六艺,希望他们成为学识与修养并重的君子,并将自己的思想传承下去。儒家素有“君子比德于玉”的理念,河南博物院藏的四璜组玉佩,正是这一理念的写照。组玉佩由玉璜、玉璧、玉珩、玉冲牙、玉珠等器物串成,具体的组合方式具有极大的自由度,但其中玉璜的数量,暗示着使用者的等级地位。比如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组玉佩,国君所用为七璜,夫人所用为五璜。周人重礼,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仪,失仪本质上就是失礼。因此,古代贵族的坐卧行止都极为讲究仪态,步行时基本都是慢步轻移,以不使身上的佩玉撞击出声为标准,正所谓“珩佩玉所以节行止也”。一件组玉佩,将古代谦谦君子的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评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思想成为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在塑造中国文化特性、锻造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展厅的结尾处,孔子博物馆的“商周十供”分坐两旁,气势恢宏。乾隆皇帝第五次前往曲阜祭拜孔子时,看到阙里庙堂上陈列的“汉五供”等礼器,认为其色泽不够古朴,便御赐了十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作为祭孔礼器,这便是“商周十供”的由来。这套古代国家祭孔礼器,造型精美、规格极高,既承载着不同朝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与礼敬,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礼仪的源远流长。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从求学、从政,到周游列国推行其仁政主张,再到回到鲁国后编撰诗书,一幕幕过往历历在目,孔子的形象愈发饱满。

正如展览结语所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为行道而奔走于天下,虽“累累若丧家之狗”仍矢志不渝,最终成就了儒家思想的精神涅槃。木铎心声,千载回响。儒家学说升华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影响至今不息。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世精神,仍然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奋然前行。

山东与河南地域相近,人缘相亲,血脉相通,孔子周游列国的足迹始于鲁,行于中原,这段历程既是一次思想的远征,又是一次文化的交流。本次展览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情致敬,亦是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华龙洞古人类化石 为现代人起源研究添新可能

□ 本报记者 宫小韵

11月25日,纪念“华龙洞人”头骨化石发现十周年座谈会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召开。会上公布了新发现的一颗人类牙齿化石,一块疑似股骨化石及大量小型哺乳动物化石,为东亚古人类种群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

山东大学考古学教授王伟,参与了此次学术研讨和华龙洞遗址的实地考察。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华龙洞遗址的发现,让东亚古人类演化的故事,有了更多可能性。

新发现待解

位于安徽池州东至县的王龙洞遗址,总面积8.6万平方米,是继北京周口店遗址后中国最具价值的古人类遗址之一。1988年,安徽东至县尧渡镇村民在修建羊圈时,发现大量碎骨化石。经研究人员系统发掘,华龙洞遗址正式揭开神秘面纱。2015年,“华龙洞6号”头骨化石出土。此化石完整保存了面部轮廓与下颌骨关键特征,确认属于一名13岁女性,被学界命名为“东至姑娘”。截至目前,该遗址已累计出土40余件人类化石、400余件石制品及100余种动物化石,构建起30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图景。

“东至姑娘”的发现,实证30万年前东亚人类已完成从“古老型”向“现代型”演化过渡,为“本土连续演化”假说提供了核心实物证据。“过去我们认为,100万年前至40万年前的东亚古人类舞台,主要由直立人主导。但‘东至姑娘’的形态特征打破了这一认知。”王伟介绍,华龙洞古人类既非典型直立人,也不同于现代人,其形态中保留的原始特征与进步特征的交织,预示着东亚人类演化路径远比此前认知的复杂。

此次披露的最新考古成果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这颗人类牙齿化石距今多少万年,与“东至姑娘”是否属同一时期?对此,王伟强调,此次座谈会披露的最新考古成果的学术价值需要科研人员进一步揭示。

“新化石刚出土不久,还处于‘待研究’状态。”王伟解释,对人类牙齿化石的评价必须经过两大核心步骤:先通过测年确定具体年代,再由人类学家完成形态学鉴定明确种归属。即便完成基础研究,要将其与30万年前的“东至姑娘”建立直接关联还有不小难度。“若新化石距今仅几万年,与前者便存在二十多万年的时间间隔,其间演化可能性太多,直接推断亲缘关系缺乏科学依据。”王伟说。

对于新发现的小型哺乳动物化石,其价值同样需要进行动物群组合研究以及测年。“但无论如何,这些小型哺乳动物反映的环境背景,将为科研人员重建当时的生态环境提供重要的古生物学依据。”王伟说,目前这些化石的研究尚未启动,“我们期待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为东亚现代人起源增添“新选项”

华龙洞遗址的学术价值,围绕“现代人起源”这一世界级命题展开。长期以来,“非洲起源说”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多数学者认为包括东亚人在内的现代人祖先均源自非洲早期智人。

“非洲起源说”的广泛认同,源于非洲30万年前至几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序列完整,演化脉络清晰,而东亚相关化石长期匮乏,才让“非洲迁入”成为主流认知。但华龙洞遗址的发现为这一共识增添了“变量”。

“30万年前,非洲已出现具备现代特征的古人类化石,而华龙洞遗址发现了特征相似的古人类化石。”王伟指出,“我们现在还很难否定‘非洲起源说’,但‘东至姑娘’的发现表明现代人起源可能更为复杂。”华龙洞古人类为东亚现代人起源的探索增加了“备选方案”:今天东亚人群的遗传基因,或许未必完全源自西方,既然华龙洞古人类存在,就不能排除他们独立演化或参与东亚现代人形成的可能。

但需要注意的是,华龙洞古人类与今天东亚人的遗传关联尚无法确认。王伟指出,即便北京周口店田家洞45000年前的化石,也已证实与现代东亚人群无直接遗传关系,更不用说30万年前的华龙洞人。古人类演化研究如同“填空”,需不同年代的多化石证据才能构建完整链条。30万年前到今天的化石证据缺口巨大,目前无法得出定论,“但华龙洞古人类提供的独特样本,在人类演化版图‘钉下了关键节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曾表示,通过综合研究,确定华龙洞人生存时间为33.1万年前至27.5万年前。这群古人类以山洞为栖息地,是一个20人左右的“大家庭”。

王伟表示,此前对哺乳动物牙齿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30万年前华龙洞人群生活在森林与草地相间的“马赛克”环境中,这种生态条件为理解古人类生存策略提供了关键支撑。

受制于年代久远,古DNA测序技术在华龙洞遗址的应用面临困境。“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古DNA保存极限约1万年,华北约5万年,30万年前的遗存中DNA可能已完全降解。”王伟介绍,华龙洞研究团队已开展古蛋白组学分析,目前已从遗址哺乳动物化石中成功提取骨蛋白,相关研究正在推进。



根据头骨化石复原的“东至姑娘”。张理想 摄

